



■責任編輯：謝孟宜

劉夢熊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華兒女，不管
穿甚麼服裝，不
管是甚麼立場，
起碼都有中華民族
的自豪感。香港人也
是有這種民族自豪感
的。」黃霑作詞、王福齡作曲的

《我的中國心》，唱出了大多數港人的心聲：「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長江長城，黃山黃河，在我心中重千斤，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心中一樣親。」《我的中國心》藝術地表現出，愛國往往是國家認同的昇華，而國家認同則是愛國的前提。

國民教育既是國際慣例又是普世價值

正如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在動議辯論的開場發言表示：「我們提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主要以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為宗旨，確立個人於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各範疇的身份認同，建立個人抱負和理想，對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作出承擔及貢獻，並蘊含誠信、關愛、責任感、承擔精神、尊重別人、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因此，這些普世價值觀在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時一定會受到重視。」國民教育既是國際慣例，又是普世價值，認同我們的國家，與誠信、關愛、責任感、承擔精神、尊重別人、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觀，是相輔相成的。

反對派抗拒國民教育，其實質是抗拒中國合法行使國家權力的政府組織即中央人民政府，其要害是「去中國化」。對此，香港教育界、社會各界、學校、家長和公正中立的傳媒，都應予以警惕。

指點江山



反對派抗拒國民教育的要害是「去中國化」

立法會昨天否決由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提出有關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的議案。何俊仁的議案，潛意識乃是將香港當作獨立的政治實體，與「台獨」勢力的「去中國化」異曲同工。抗拒國民教育的反對派應該思量一下，九七回歸令香港由英國殖民統治變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存在決定意識」，推行國民教育，根植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情和使命感，完全順理成章，有甚麼理由學陳水扁「去中國化」？

何俊仁的議案含血噴人，明明是「中小學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根本不是『洗腦』，而是『健腦』」，何俊仁偏要歪曲為「洗腦」，足見人心術不正。何俊仁誣譖新科目的設立「被利用成為灌輸政治思想的工具」，反對派議員誣譖國民教育是「愚民」、「洗腦」、「政治宣傳」、「狹隘民族主義」，種種誣譖不實之詞後的潛意識，是將香港當作獨立的政治實體，其實質是與「台獨」勢力「去中國化」一鼻孔出氣。

何俊仁割裂「國家」三要素

20世紀初的幾位法國和德國學者如Jellinek、Laband、Carre de Malberg，創立了國家三要素理論，強調一個正常國家必須是統一的主權、領土與國民。所謂主權統一，就是這個國家有且僅有一個合法行使國家權力的政府組織；所謂領土統一，就是這個國家主權所及的海陸空的範圍是統一的；所謂國民統一，是指所有服從於一個主權權力的人民，可以是一個民族，也可以包括若干民族。何俊仁的議案稱：「區別熱愛國家與關懷民族，跟支持政府、政黨、政權及政治人物的不同之處，從而了解愛國愛民不等於愛黨和支持領導。」何俊仁露骨地抵制國民教育中最核心的國家認同，把

中國國家主權、中央人民政府、國家執政黨與「國家」割裂開來，表面上不反對國民教育和愛國教育，但卻抵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要推翻國家執政黨和改變內地的社會制度。

令人想起「台獨」的「去中國化」

在香港回歸十四年後的今天，反對派還抗拒國民教育，反對根植對國家的認同、感情和使命感，以種種藉口抗拒國民教育甚至將其妖魔化，令人不禁想起「台獨」勢力的「去中國化」舉措。

台灣自從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在先，陳水扁叫置「一邊一國」在後，配合其「法理台獨」的步伐，在國民教育中「去中國化」是重要部署。例如，「台獨」分子把中國歷史列為「外國史」，叫嚷「尤其要破除以中國為中心的奴隸心態」。民進黨的《文化政策白皮書》中寫道：「過去的『中華民族—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因為違背了多元融合的理念，並且有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必須逐漸徹底拋棄」。《白皮書》還進一步聲稱，圍繞國民教育，「當前台灣民族主義在最高層次是對中華民族、中國人及相關的中國政府的反抗」。在「台獨」勢力影響下，「台灣

意識」、「台灣精神」、「台灣生命共同體」等等脫中國意識，以及「台灣是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之類的謬論，充斥在教科書中。「台獨」分子杜正勝還提出「同心圓概念」，主張以台灣為主軸，在教材中把「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名詞都割掉。

反對派在國民教育上「去中國化」並非偶然

反對派在國民教育上「去中國化」並非偶然，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奉行「去中國化」。2007年特首選舉，梁家傑(公民黨現任黨魁)的參選政綱明確表示，「問責局長由行政長官委任已經足夠，中央任命一層應可取消」，這是赤裸裸「去中國化」、「去中央化」。何俊仁今年5月中連續三天發表文章，聲稱「香港民主派的對手是在北京管治整個中國的中共中央及其領導的中央政府」，其「一邊一國」的心態呼之欲出，仇視中央政府和「去中國化」的立場暴露無遺。反對派政治上的「去中國化」，決定了他們必然在經濟上搞「去中國化」，例如公民黨等反對派從來沒有停過阻止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

香港人當然有民族自豪感

按照國際慣例，培養公民的國家認同，是國民教育的核心內容。西方發達國家以至韓國、新加坡、俄羅斯、波蘭等國家，都在國民教育中強化國家認同，這些國家的公民，都以他們的國家為驕傲，都以為他們國家的公民而自豪。鄧小平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改變了中國的形象。中國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軍閥、也不是蔣氏父子創造出來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了中國的形象。凡是中

克勤關注跨境童 唐唐即北上做嘢

各方關注

俗語說：「只要肯努力，就會有回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在披露特區政府限制跨境學童取道邊境禁區乘校車上學，造成使用「假禁區紙」的問題後，受到廣泛的關注。繼上星期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CY)在立法會午宴期間主動向克勤仔索取有關資料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唐唐)昨晨就親自到羅湖和落馬洲關口，視察跨境學童的情況，更表明態度，強調特區政府必須早作綱繆，一定要處理好學童跨境外上學問題。



事關近萬名跨境學童的安全問題，克勤仔和北區議員劉國勳，昨日聯同新界北區多間小學校長，與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及保安局官員會面。克勤仔於會後說，多位小學校長強調，特區政府在推出任何措施前，應顧及跨境學童的安全，並認為當局應先維持羅湖禁區紙在今個學年水平的數量(即約2,300張)，及暫緩由下個學年起，停止向小四學生發放羅湖禁區紙的安排，再謀長遠解決方案。

民建聯見陳維安 巧合同日視察

他們並建議，鑑於區內小學和幼稚園的上課時間不同，政府發出的禁區紙應以時段劃分並發放，以增加容量。同時，政府長遠應在規劃中的蓮塘口岸，預留位置供校巴停泊和使用，從而紓緩其他口岸的壓力。陳副局長回應稱，會研究適當措施處理，當局稍後亦會舉行跨部門會議，跟進此事。

克勤仔致力就此問題向特區政府反映意見，除了引起CY的關注外，唐唐昨晨亦「事有湊巧」地，在克勤仔與陳維安會面的同日上午的上學段，到口岸視察跨境學童上學的情況。

唐唐首先到羅湖管制站入境大堂，視察跨境學童使用學童特設道及入境專櫃的情況，並深入了解該類學童在各個口岸過境的具體安排、人數分布、學童禁區證的簽發和使用現況等，又向上學途中的跨境學童接觸了解他們對過境安排的感覺。

唐唐又察看了接載持禁區紙學童的保姆車所通

首要保學童安全 因應實際改善

他強調，經羅湖管制站過境的跨境學童數目不斷增加，而跨境學童的安全必須是首要考慮。在此前提下，特區政府需要因應實際情況，不時檢視跨境學童禁區紙和保姆車的合理數目，最大程度地方便學童。

隨後，唐唐再到落馬洲(皇崗)管制站，了解為跨境學童而設的「點到點」跨境校巴服務運作，並了解當局研究增設校巴泊位和實施「免下車過關檢查區」的構思。他促請有關部門加紧進行研究，以便分流部分跨境學童，紓緩羅湖和落馬洲支線口岸的壓力，而實施免下車過關檢查亦為學童提供更加方便和安全的跨境校巴服務。

政府須優化安排 人口政策着手

唐唐在視察後表明，預期跨境學童數目將持續增長，特區政府必須早作綱繆，在中短期採取增設過境設施、分流、優化配套管理安排等措施。

長遠而言，他認為特區政府有需要在人口政策的範疇研究如何進一步改善內地港人子弟班的質素和配套，及增加學額的可行性，以鼓勵更多內地港人子女特別是年幼的學童在內地接受港式教育，免卻他們跨境的舟車勞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唐英年參觀羅湖管制站，向一班剛抵達的學童打招呼。



■陳克勤和劉國勳等昨與陳維安見面，討論跨境學童問題。

極端抗爭：咁多少次頭也彌補不了



繼五月十六日在汀九橋上的鬧劇，從事雞苗運輸業的男子劉玉棠再次以死相逼，釀成悲劇，四十八歲警長就此魂斷干諾道中天橋。以極端手法抗議，確實能惹來迴響。但物極必反，如今執法者無辜犧牲，抗議者不但不獲支持，更遭眾人唾罵。在情在理，甚至從實際效益角度分析，整件事無人得益。事情蒙上了陰霾，問題打下了死結。

劉玉棠挑選人流眾多的中環下手，在行人天橋上綁上橫額，動機可恥。此舉既浪費大量消防員及交通警察資源，救生氣墊又使繁忙的交通網絡癱瘓。透過這些花招強迫大眾留意他，實在卑鄙。激進派

每每興風作浪，製造騷動，以阻塞、不便、傷亡等招數吸引注意，有違文明社會克制忍讓、和平申訴的德性。

劉玉棠不滿的並非牽涉社會民生的重大議題；他亦非代表甚麼團體爭取利益。劉玉棠只憤恨食物環境衛生署沒有因禽流感而給他賠償。橫額上盡是「我」、「我」、「我」，而非雞農或運輸業界。他大談一己利益和人權，像是患了被迫害妄想症一樣，咬着周一嶽的名字不放。慘劇源於個人不忿及利益，罪孽更深。若然他堅信自己是對的，他大可訴諸法律，追討所謂合理的賠償。但，應否將難以預料的天災瘟疫歸咎港府？業界是否應承受一定風險？我相信劉玉棠和行內人士心中有數。再者，「叫天不應，求助無門」一說更為荒謬，劉玉棠若感

陳業禧
香港大學
刑事司法學二年級生

不滿，可到申訴專員公署聲討各官員，在公眾場合叫「狗賊」、「無人性」等詞語實在無補於事；以自殺綁架傳媒和大眾更是煩人。

筆者曾參與組織示威活動，親眼目睹部分議員精湛的演技。為了得到民間支持和傳媒焦點，他們善於在傳媒镁光燈下張牙舞爪，高聲疾呼。記者散去後便立即靜如止水，鳴金收兵。請議員顧及市民大眾。基於「新聞價值」，大眾接觸到的往往只是最喧動的那個鏡頭、最煽情的那篇報道、最轟烈的那些動作。暴力文化被烏合之眾視為抗爭的捷徑，後果堪虞。在兩次鬧劇中，劉玉棠皆在橋邊來回踱步，根本無心尋死，待警察、記者、救護員、消防員趕到現場才發表謬論。

耐人尋味，兩次混帳皆有陳偉業議員相伴。兩、三年來，陳議員一直在背後支持劉玉棠。陳議員對「支持」的定義或許有所誤解。若然真的為大眾福祉着想，請盡議員本分，主動擔當官民橋樑，做點

有建設性的事協助解決問題。絕不應教唆莽漢做損人不利己之事，更不應為慘劇塗上政治色彩。陳偉業罵道：「如非周一嶽拒絕接見，就不會發生悲劇！」那麼，若然立法會主席邀請使用暴力的議員離場，議員因此在外傷天害理，主席和整體議員用不用負上刑責？此說不但沒有因果邏輯可言，還盡顯野蠻霸道、推卸責任的政治哲學，對事情毫無幫助。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是現代社會學的鼻祖。這英國政治哲學家深信「社會契約」，我們為了生計、安穩、秩序，願意抑制個人慾望，安分守己，互相合作，締造更好的社群。劉玉棠把個人權益凌駕公眾之上，極端手段迫使社會揹上代價。這趟，警務人員及死者家屬飽受痛楚、公眾的便捷和利益受損，整件事情全是文明的倒車。無論叩多少次頭、致多少遍歉，罔顧後果的激進派也彌補不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